

建构武曌神都的权力空间

Constructing Spaces of Power in Wu Zhao's Divine Capital

聂清风*

(NIE Qingfeng)

摘要

武曌在洛阳建立了自己的朝代，将这座城市作为自己的神都。本文研究洛阳城市景观如何在武曌主导下改变形态，以及武周臣民如何接受、改造、消费这一城市景观。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性皇帝，武曌将统治合法性的建设和巩固提高到一个全新层次。这种前无古人的高度和广度具体体现在洛阳及其周边地区经历的物理、人口、经济、政治景观的全面改造上。武曌臣民们也加入到这一事业中来，正是他们将宏伟蓝图变为现实，同时也经过必要的妥协和调整。每个人的城市经历交汇在一起，不仅在城市土地上结晶和沉淀，而且进入传统史书记载，并且作为叙事在各种非官方渠道里流通，其中就包括流言。

关键词：武曌、洛阳、流言、城市史

Abstract

Wu Zhao founded her own dynasty in Luoyang, and established this city as her Divine Capital.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ityscape dominantly transformed by Wu Zhao and its acceptance, transformation, and consumption by her subjects. As the only female emperor in Chinese history, Wu Zhao raised the level of development and solidification of the legitimacy of her ruling to a new height and a new scale, which was explicitly expressed through her transformation of the physical, demographic, economic and political landscape of Luoyang and its surroundings. In this endeavour, joined her subjects, she made her grand design come to existence with necessary compromises and adjustments. Their amalgamated urban experiences not only crystallized and settled in the soil of Luoyang and on the pages of conventional historical works, but also circulated as narrative through various unofficial channels, including gossip.

Keywords: Wu Zhao, Luoyang, gossip, urban history

* 聂清风博士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助理教授。电邮地址: qingfeng.nie@newera.edu.my

前言

七〇五年正月廿七日清晨，姚崇（650-721）（又名元之）从洛阳慈惠坊宅邸出发了。（徐松2006：346）他盛着官服沿洛水南岸急匆匆往端门赶去，在门前与同僚会合之后，他们集体进入皇城，然后进入宫城觐见两天前刚刚登基的新皇帝。（司马光2013：6785）皇帝今日要带领包括姚崇在内的群臣前去拜访武曌（625-705）（即武则天）。这位已经逊位的皇帝同时也是皇母被幽禁在上阳宫，奄奄一息。（刘昫1975：3022-3023；欧阳修1975：4382；司马光2013：6785-6788）

走在天街上，姚崇情绪激动起来。这条街道也叫定鼎门街，是神都洛阳的中轴线，从端门笔直延伸直抵都城最南端的定鼎门。而近在咫尺的天津桥下，洛水暗流涌动，其中居住着显圣侯，这个尊号正是武曌在六八八年赐给河神的。（司马光2013：6651）北面的皇城和宫城在庄严的明堂庇佑和监视之下，明堂本身也遵循武曌命令兴建于六八八年，又于六九五年重建。（司马光2013：6649-6657，6700-6702）姚崇南望，心中隐隐浮现卢舍那大佛，沉思的报身佛在永恒的微笑中眼光微垂，摄人心魄。这尊龙门石窟最大的佛像在七〇年代能够落成仰赖於武曌的私人捐助。（刘景龙1998：379-380）而在西面，姚崇似乎依然能够听到十六天前正月十一颂佛念经的热切呼告，迎接长安法门寺舍利的到来，这一盛事也由武曌首倡和主持。（崔致远1983：第50册280-286）东面远处的嵩山在六八八年和六九六年先后两次被武曌册封为神岳。（司马光2013：6651-6706）洛阳城市景观在武曌统治下经历了深刻转型，被赋予神性，神都居民对她的统治合法性铭心刻骨并心悦诚服。也正是在这座城市，姚崇的才能获得了武曌赏识，最终被提拔为宰相。（刘昫1975：3021）

朝臣追随皇帝探望了囚禁中的逊位皇帝。望着病卧床榻的武曌，姚崇终于忍不住哭泣。同僚们提醒他注意场合，不宜落泪，告诫他这是在自找麻烦。姚崇回答：“元之事则天皇帝久，乍此辞违，悲不能忍。”当日即遭外贬。（司马光2013：6788；刘昫1975：3022-3023）武曌的统治至此终结。下月四日洛阳也不再是神都。（司马光2013：6787）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曌一向广受学界关注。¹本文聚焦武周（690-705）政权的神都洛阳，考察诸如正史、历史地理载记、考古发现、历史轶事以及洛阳历史建筑重构等多种证据，分析城市建筑景观与政治景观之间的互动，进而讨论武曌在其中扮演的主导性角色，以及武曌本人及其臣民对互动之中形成的城市景观的接受、改造与消费。本文认为武曌将洛阳城市建设和自我统治合法性的巩固提升到了历史新高度和新广度，这具体体现在城市及其周边环境物理景观和政治景观的双重改造上。这一改造过程也离不开臣民的加入，正是他们使武曌的宏大设计得以落地，尽管经历了必要的妥协和调整。多方合力将洛阳建构成为武曌神都，使前朝首都长安相形见绌。

¹ 陈寅恪 1935，137-147；陈寅恪 1936，553-556；陈寅恪 1954，33-51；Lin Yutang 1957；徐素 1958；李唐 1963；Fitzgerald 1968；Guisso 1978；熊德基 1979；Twitchett 1979，244-321；雷家骥 1981；胡戟 1986；吴枫 1986；澤田瑞穗 1986；郁贤皓 1987；何磊 1992；赵文润 1993；氣賀沢保規 1995；刘曼春 1997；张萍 2008；Woo 2008；Rothschild 2008；Rothschild 2015；雷家骥 2015；司海迪 2018；王双怀等 2018；王双怀 2019。

一、改造中轴线

天街南北走向，两端分别指向龙门和北邙山，构成了洛阳的权力中轴线，自然也就成为武曌改造前朝陪都成为新朝首善之区的急迫政治任务。为了定义和展示洛阳的神圣性，进而主张并宣扬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武曌在这条中轴线上推行了三项重大建设工程：明堂、天堂和天枢。图1标明这三大工事在皇城、宫城的地理方位，定点不仅依据多种历史、地理记载，而且得到了近年考古发掘的确认。本文讨论所涉及到的其他地点也在此图标识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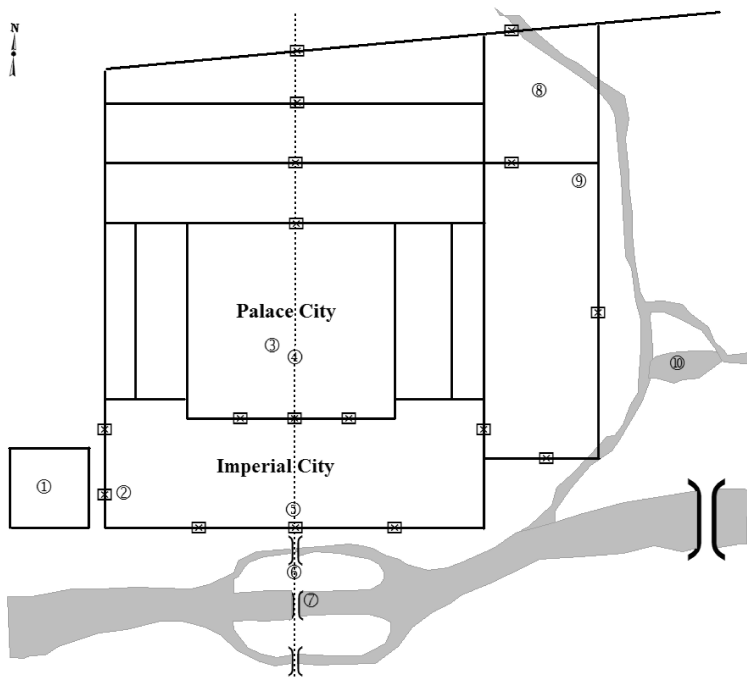


图1：本文涉及的地点

- | | | | | |
|-------|-------|-------|-------|-------|
| 1 上阳宫 | 2 丽景门 | 3 天堂 | 4 明堂 | 5 端门 |
| 6 天枢 | 7 天津桥 | 8 含嘉仓 | 9 大理寺 | 10 新潭 |

自绘。参考以下资料：方孝廉 2016：5；妹尾達彦1997：67-1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2014：5。

六八八年二月，武曌下令兴建明堂。十个月后，即十二月廿七日，明堂建成。²《旧唐书》详细描述了这一建筑：

² 司马光《资治通鉴》，6649-6656。《旧唐书》记载明堂建成在此年正月五日，而杜佑、司马光系此事于十二月。请参阅刘昉《旧唐书》，862；杜佑《通典》，1227；司马光《资治通鉴》，6656。

凡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南北各三百尺。有三层：下层象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辰，圆盖，盖上盘九龙捧之；上层法二十四气，亦圆盖。亭中有巨木十围，上下通贯，栢、栌、櫟、槐藉以为本，亘之以铁索。盖为鸱鹖，黄金饰之，势若飞翥。刻木为瓦，夹纈漆之。明堂之下施铁渠，以为辟雍之象。号万象神宫。（刘昫1975：862）

工事完成之后，武曌不断邀请洛阳妇女和天下老人前来参观，还提供珍馐美酒。（刘昫1975：864）她还颁布诏令，来年正月初一在明堂举行祭祀典礼。诏令总结了这座新建筑的主要功能：

时既沿革，莫或相遵，自我作古，用适于事。今以上堂为严配之所，下室为布政之居，光敷礼训，式展敬诚。（宋敏求1959：410）

由于明堂专为皇室兴建，且由皇帝亲自举行祭祀仪典，这座建筑毫无疑问在公开场合象征皇权。³这座建筑历朝历代位于国都南郊，皇帝作为神圣统治者在此向祖先献祭，以此垄断尘世与上天的交流，成为沟通臣民与天地灵力的媒介。随着明堂的兴建，武曌无异于昭告天下自己将推翻李唐，代之以新朝，并登基为帝。因此当六八八年她要求李唐诸王前来神都拜谒明堂时，立刻引起诸王的警觉，他们认定武曌企图将李唐王族收编于洛阳以行残害，最终引发了反武“叛乱”。武力行动不过两月即遭弭平，武曌登基已经无人可以阻挡。（司马光2013：6651-6653）

为了遮蔽长安的光辉，也为了宣扬新时代的来临，武曌通过明堂的修建改造了洛阳的城市中轴线。她丈夫唐高宗（649-683在位）治下兴建的乾元殿被推倒（刘昫1975：86），象征李唐王朝的覆灭。武氏别出心裁选址宫城中心建造明堂，此处不但用来祭祀上天和先祖，而且还成为颁布诏令的所在。然而最让人惊叹的还是明堂那八十七米的高度，比建造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城市测绘坐标原点国际饭店还要高三米。在那个历史时刻，洛阳城市居民仰望明堂时发自内心的敬畏与骄傲以及对武氏统治的心悦诚服依然感染着今天的我们，尤其当我们站在南京西路和黄河路交叉口凝视国际饭店的时候。不过洛阳臣民的感情应该更深刻，毕竟七世纪洛阳的天际线比二十一世纪上海市的天际线要低得多，同样高度的明堂因而更显巍峨。而且，宫城之中的皇家肃穆为上海所无，导引城市居民追随这一伸向苍穹的庞大建筑与宇宙展开对话，而武曌在其中扮演不可或缺的中间人角色。

武曌迁移并改造了传统明堂，万象神宫成为一座官方纪念碑，代表武氏和她的帝国。这座前所未见的丰碑象征旧王朝的埋葬，表达她建立由一位女性统治的新帝国的意志，确立她对最高权力的牢固把持，别人不得觊觎。更直接的是，这座丰碑在洛阳中轴线上创造了一个社会空间，形制、结构、功能都独一无二，供城市居民和来访者感知、构想并体验。通过与这一社会空间的互动，武曌为其子民提供了一个新时代的

³ 关于明堂自远古迄七三七年间的历史，请参杜佑《通典》，1214-1229；精细又精彩的英文考证，请参Soothill, *The Hall of Light: A Study of Early Chinese Kingship*。

参与资格。丰碑的硕大无朋令臣民敬畏、骄傲、有时甚至困惑，由此认识并确立各自的社会地位，其中包括武曌的最高权威。正如亨利·列斐伏尔在讨论纪念性的时候简洁有力地指出：“纪念碑达成共识，并且让这一共识变得现实而具体。”（Le monument réalisait un «consensus»: effectivement, le rendant pratique et concret.）（Lefebvre 1974: 253）尽管李氏诸王叛变，武氏的规劝总体来说相当成功，接受她和她王朝的共识业已达成并巩固。洛阳居民在乱中保持稳健，拒绝加入李唐诸王，叛变因而未能持久。

六八九年正月初一，武曌在明堂举行大飧、大赦、改元。初三在明堂接受诸臣朝贺。初四在明堂颁布诏令，规范官员行为。初五武氏又一次出现在明堂，宴飧百官。

（司马光 2013: 6658-6659）据《旧唐书》记载，此年开始直到六九九年，武曌几乎每年正月初一都前往明堂举行大飧和大赦，连续七天甚至九天宴飧百官，并且常常更改年号。（刘昫 1975: 119-127）六八九年武曌以周朝（约公元前1046-前256）为正统，引入该朝建正系统，以唐朝行用的夏（约公元前2070-前1600）历十一月为正月。（林宝 1994: 882; Rothschild 2008: 159-160）表1标明这一改变：

表1：夏历、周历、武周历的建正

天干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夏	十一	十二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周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武周	正	腊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来源：Wilkinson 2012: 700。

武曌改正朔的举动也改变了天体系统，正月斗柄在黄昏时分的指向发生变化，由指寅辰转为指子辰。这一转变在政治上象征统治权力易手。（Wilkinson 2012: 503-504; Kroll 2015: 198）仔细考察上表就能发现武曌的历日实际上是夏历和周历的混合。武周历中，正月与周历正月相合，二月至十月则与夏历相合。不知出于何种考量，武氏在七〇〇年决定恢复夏历。（司马光 2013: 6756）

通过十二个月的复杂安排，尤其是建正，武曌重调了天地时间，六八九年因此减少了两个月，宇宙循环也被重置，以寅为始变为以子为始。常常在年中发生的不断改元更宣扬了武氏且只有武氏自己才能接收天命。这一系列变更不仅提醒臣民们他们仰赖武氏与天地洪荒之力沟通，同时也重置了时间节奏，此年尚未结束而新时代已被引入并立即开始。

六九〇年正月初八，武曌启用了十二个新字。（司马光 2013: 6664-6665）在她统治期间武氏先后五次启用新字，新创至少十八个字进入汉字书写系统，⁴现列图2如下：

⁴ 武周新字研究甚多，请参两篇代表作：常盤大定〈武周新字の一研究〉，5-42；施安昌〈从院藏拓本探讨武则天造字〉，30-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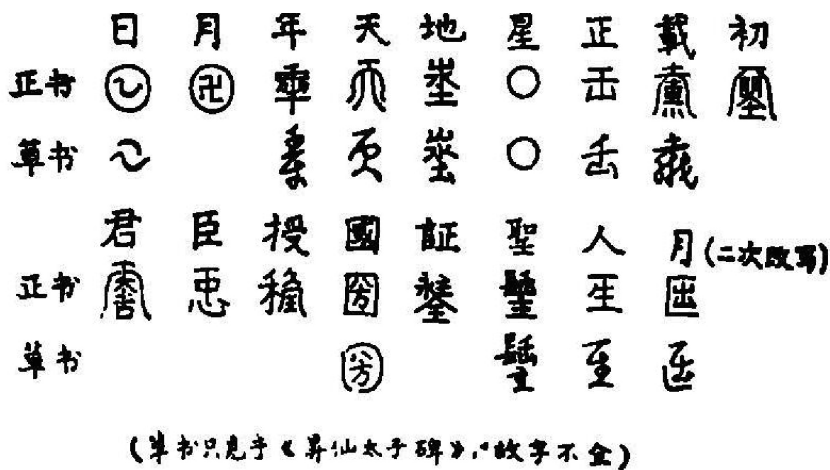


图2：武曌新造字

来源：施安昌1983：33。

这些新造字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月”、“星”、“天”，“地”等字。武曌改变了宇宙中这些关键元素的表达和再表达，用以界定武周新朝的独特性和合法性，用以改造天、地、人三个世界的交流代码，并用以宣示自己皇权的至高无上、不容挑战，包括来自人间世的挑衅。普天之下的人们，包括武曌自己，提笔写字即被提醒上述三项功能。她的精心设计即使今天依然显见。任何人前往洛阳访问千唐志斋，瞟一眼镶嵌墓志的博物馆墙壁，必定立刻注意到武曌创制的独特圆圈形文字，提醒我们那个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女性皇帝统治的朝代。金石家叶昌炽（1849-1917）经眼数百方武周时期的碑志，远自今新疆巴里坤、甘肃敦煌、广西龙州、云南昆阳、广东罗定等荒僻之所，不禁惊叹：

皆唐时边远之地，文教隔绝，迺纪元年月亦皆用新制字，点画不差累黍，
虽秦汉之强，声灵远讫，何以加焉。（叶昌炽1995：46）

一方面，我们不难想象武曌为了在广袤帝国之中推行和强化这些新字的使用时，所动用的庞大物质资源和政治资源。另一方面，这些碑志为叶氏经眼并诉诸感叹的经历也证明武氏努力的有效性，新字的推行确实在帝国内外促进形成了新皇室坚定的追随者。

总之，宇宙时钟、天地周期、时间节奏以及与上天交流的代码都经过了重置，日常生活的运转因而被打破。大赦的反复推行、年复一年的大飧、持续的奢华宴会以及皇室官民的聚会，这些活动都发生在明堂，将洛阳的日常改造成节日。

耐人寻味而绝非偶然的是，列斐伏尔在讨论纪念性时最后总结道：“建筑之于纪念碑，正如日常生活之于节日。”（Le bâtiment a le même rapport au monumental que la quotidienneté à la fête.）（Lefebvre 1974：256-257）用纪念碑性的明堂取代乾元殿，把

洛阳城的日常生活提高到节庆的水平，武曌的庞大计划看起来充满激情，野心勃勃。武氏在明堂颁布各种诏令，举行重大仪式，表明她对自己统治合法性进行不断宣示、强调和更新的持续需求。这一需求反过来揭示了这位女性皇帝缺乏信心 and 安全感，表明臣民们对她发起过或直接或间接的持续怀疑和挑战。明堂的设计和建造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王溥（922-982）在《唐会要》里用一整卷来讨论七至八世纪皇帝和朝官们就明堂建制展开的激烈争论。（王溥1955：271-281）因此，武曌别无他法而又聪明绝伦地避开了朝堂之上的公开讨论，转而把这项工程委托给自己的情人薛怀义（662-694）以及一些出身低微的谏官。（司马光2013：6649）明堂落成之后，依然有朝官抗议其过于奢华。（司马光2013：6657）六九一年明堂大飨之后，更有官吏立刻上书，声称程序不合礼制。武曌做出妥协，保证下次必定遵礼而行。（刘昫1975：864-865）下面这个例子涉及吉祥征兆。某天有位平民来到洛阳，献上龟甲一副，腹部镌刻“天子万万年”五字。一位朝官用刀刮去这些字，要求追究这位平民的法律责任。但是武曌下令释放该民，认为这人的出发点不算坏。（司马光2013：6686-6687）这桩轶事与我们的讨论极有关系，因为它表明女皇帝对特定征兆的解读和判断没有躲过臣子的检验甚至挑战。在既定的建造技术下，武曌、她的情人和朝臣三者之间的不断交涉决定了明堂工程的推进以及这一社交空间的使用，并且时不时还包括洛阳居民们的参与。必须指出，武曌有时主导交涉过程，但几乎从未曾垄断。

除了明堂，武曌还在洛阳权力中轴线上下令兴建了一座更高的建筑。⁵

于堂后又为天堂五级，至三级则俯视明堂矣。未就，并为天火所焚。至重造，制度卑狭于前。（杜佑1988：1228）

太后命僧怀义作夹纆大像，其小指中犹容数十人，于明堂北构天堂以贮之。

（司马光2013：6700）

所有史料都指出天堂是一座佛教建筑，大像是一座佛像。（杜佑1988：1227；刘昫1975：865；司马光2013：6700-6701）尽管天堂的建筑细节已经无从考证，现代考古发掘表明该建筑是一幢独特的圆形结构，基址不在明堂正北方，而稍稍西偏。（方孝廉2016：20-32）兴建这所独特的圆形佛教建筑并计划其高度超过明堂，其理由可能主要有以下四点。第一、武曌自己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从小在家庭里耳濡目染佛教教义。（陈寅恪1935：137-147；饶宗颐1974：397-412）在即将建立自己王朝的紧要关头，武曌祈求佛教祝福和护佑合乎情理。第二、正是在佛教伽蓝长安感业寺，武氏与高宗相遇，以此为契机进入高宗后宫，命运由此改写。（刘昫1975：115；欧阳修1975：81；司马光2013：6484）武氏决定在洛阳兴建这座独一无二的佛堂，很可能寄希望于再一次改变自己的业报，成就帝业。第三、唐太宗（626-649在位）于六三七年颁布诏命，道前佛后，道教鼻祖李耳（约公元前571-前471）被追认为李唐皇室先祖。（宋敏

⁵ 我们不清楚明堂、天堂的兴建和重建细节。Antonino Forte试图构建一条清晰的时间线，但是过于繁复，似乎不切历史事实。请参Forte, *Mingtang and Buddhist Utopias in the History of the Astronomical Clock: The Tower, Statue, and Armillary Sphere Constructed by Empress Wu*, 261-269。

求1959: 586-587) 为了挑战李氏家族的崇高地位, 武曌可能选择在洛阳中轴线上建造一所巨大的佛教建筑并宣称佛前道后。最后, 在权力中心明堂隔壁兴建天堂, 武曌可以说服佛教僧侣站在自己这一边, 使用手中的宗教力量支持以捍卫她统治的合法性。

史料表明天枢的建造对僧侣具有充分的说服力, 若干名刹的僧人在薛怀义的监督下翻译了佛典《大云经》并在六九〇年七月上呈朝廷。⁶ (刘昉1975: 121) 他们还为本提供详细注解, 且有抄本在敦煌出土 (S. 6502):

以女身当王, 国土得转轮王所统领处四分之一。人民炽盛, 无有衰耗、病苦、忧恼、恐怖、祸难, 成就具足一切吉事。阎浮提中所有国土, 悉来承伏, 无违拒者, 得大自在。教化所属, 城邑聚落。催伏外道诸邪异见。汝于尔时, 实是菩萨, 常于无量阿僧祇劫, 为化众生, 故现受女身。

(Forte 1976: 185-186, 图1、2)

又讖云: “陇头一丛李, 枝叶欲彫疎。风吹几欲倒, 赖逢鸚鵡扶。” 陇头李者, 此言皇家李氏, 本出陇西也。……鸚鵡者, 应圣氏也。言诸虺作逆, 几倾宗社。神皇重安三圣基业, 故言赖逢鸚鵡扶也。

(Forte 1976: 224-225, 图10)

文本看似复杂, 核心思想却毫不含糊。当中华帝国在李唐皇室统治下即将倾覆的关键时刻, 武曌出面力挽狂澜, 重新巩固了李唐前三皇高祖 (618-626在位)、太宗、高宗建立的王朝根基。(Forte 1976: 193注59) 天命终究还是从唐朝转移到了武周。在上述叙事中, 武氏是李唐皇室的拯救者, 而不是敌对者。作为转轮王和菩萨, 武曌在人间世以女性形象示人, 给她的臣民提供一个崭新的繁荣未来, 好运连连, 苦难消散。在她统治下, 佛教繁盛, 其他宗教匍匐。天堂在中轴线上的兴建见证着武曌对佛教的忠诚信仰, 象征着她与佛教神力的紧密结合, 也表明她对极度奢华物质资源的掌控, 这一权威无人能够挑战。也许可以说, 武曌成功说服了佛教僧侣, 让他们相信建立一个佛教国家的时机已经成熟, 而此国由转轮王兼菩萨的武氏统治。僧侣与武曌的合作由此开始。六九一年四月, 武氏颁布诏令, 佛前道后, 僧侣先于道士。(杜佑1988: 1893)

关于天堂, 有两个细节尤其值得注意。首先, 它不在明堂正北而在其西北。武曌可能藉此向包括僧侣在内的臣民们传达一条信息, 即天堂尽管俯瞰明堂进而护佑之, 佛教并不主宰帝国权力中心, 也不垄断朝廷资助。武曌后来就命官员编纂类书《三教珠英》, 儒、释、道三教并举。(司马光2013: 6749) 因此, 天堂微妙的选址表明了佛教在神都和整个帝国扮演的重要但不垄断的角色。

第二个细节涉及明堂、天堂建造过程中使用的一项特殊技术, 夹纆。上引文有云明堂屋顶“刻木为瓦, 夹纆漆之”, 而天堂内部有“夹纆大像, 其小指中犹容数十

⁶ 关于《大云经》详尽而精彩的讨论, 请参Forte, *Political Propaganda and Ideology in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Seventh Century: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uthors and Function of the Tunhuang Document S. 6502*.

人”。建造巨大佛像时，工匠首先以黏土为主要材料勾勒出神佛的大体外形，然后用布料覆盖，施以多层漆料以塑造出雕塑的最终外形，接着敲碎内部的黏土并移除。夹纻大像实际上由布料和漆料组成，轻便而易于移动及安放进天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大像“其小指中犹容数十人”，因为雕像是中空的。⁷依照同样的逻辑，明堂屋顶没有采用真实瓦片，因为瓦片太重不适用于这一超高建筑。明堂屋顶使用了木料，外面裹漆，重量大大减轻而功能没有牺牲太多。包括夹纻技术在内的诸多技术革新使建造超高建筑成为可能，明堂、天堂因而屹立在洛阳中轴线上。

然而，这项技术有一个致命弱点，其所采用的材料不耐火。六九五年正月十六日，天堂发生火灾，延及明堂，“火照城中如昼，比明皆尽”。（司马光2013：6701）四天之后，武曌颁布诏令，释放引起火灾的工匠，要求百官悉心照料百姓，确保冤案得伸，暂停一切非必要工程，减少朝廷进献额度，鼓励举荐人才，采纳针对时政的批评意见。⁸（司马光2013：6702）这通诏令表明了武曌当时所处的困难境地。一方面，她明确指出事故元凶为天堂施工现场的工匠，他们遗落闷“火”而引起火灾。另一方面，在诏令标题上她用“灾”来定义这场事故。《左传》记载：“人火曰火，天火曰灾”。（杨伯峻1995：139）很明显，武氏在昭告天下毁掉明堂、天堂的是天火。火与灾之间，武曌通过巧妙的解释，努力故作镇定。如果火灾纯为“火”，工匠为罪魁祸首，那么这场事故暗示人的行为足以摧毁明堂以及它所代表的权力系统和神圣力量，而这两者是武曌统治合法性所系。如果火灾纯为“灾”，明堂的毁灭看起来是上天对她统治的拒绝。充分理解这两种解释蕴含的灾难性暗示，并且知道臣民正在翘首期盼事故起因，目睹大火燃烧的洛阳居民尤其引首以望，武曌迅速颁布诏令，勇敢承认这场事故既是“火”也是“灾”，坐实工匠们的罪行，又免去他们的责任。这里免责极其重要，昭告天下这个历史时刻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工匠们免于追责，武曌自己也就相应免责。无怪乎这份诏书立刻转而着眼于能够以及应该做些什么。在这个关键时刻，武曌九死一生，而成功过关。

明堂、天堂的损毁对武氏执政打击很大。面对上天、臣民和现有技术极限的挑战和质疑，武曌不得不妥协。她把过错归咎于情人薛怀义，正是他负责监督这两项工程的执行。六九五年二月四日，薛怀义被处死。（司马光2013：6704-6705）明堂作为祖庙和朝堂必须重建，隔年即开工。天堂则没有切实的重建证据。然而六九五年四月，端门以南又竖起一根巨型铜柱天枢。（司马光2013：6698-6705）

高一百五尺，径十二尺，八面，各径五尺。下为铁山，周百七十尺，以铜为蟠龙麒麟萦绕之；上为腾云承露盘，径三丈，四龙人立捧火珠，高一丈。工人毛婆罗造模，武三思为文，刻百官及四夷酋长名，太后自书其榜曰“大周万国颂德天枢”。

（司马光2013：6705）

⁷ 对于夹纻技术的精湛讨论，请参松本文三郎《仏教史雑考》，315-350。

⁸ 此诏令现存，尽管颁发日期有误，请参宋敏求《唐大诏令集》，410。

这是在中轴线上兴建的第三座纪念碑性的建筑，用料更耐久，选址更开放。然而这项工程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在于其大都会性质。我们已知参与该项工程的四位人士的出身。

表2：参与天枢建设的已知人物

姓名	毛婆罗	武三思	阿罗憾	高足酉
国籍	高丽或日本	中国	波斯	高丽

来源：欧阳修1975：893；司马光2013：6698-6705；陈长安1991：第七册84，第八册144。

建设选址不选封闭的宫城而选端门以南这块更开放的区域，天枢名字中的“万国”，以及参与工程建设人员的国际化组成，这三点都表明该工程的大都会倾向和属性。这一特点是唐太宗的遗产，中华帝国的北方和西方邻居尊太宗为天可汗。（刘昫1975：39）矗立的天枢显示武曌尽力说服其子民以及更广大的国际社会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中华帝国依旧保持开放，神都是一个国际都市。

明堂、天堂的建设，以及后来天枢的建造，改变了洛阳的权力中轴线，这座城市成为名副其实的新朝首都。在她对宏大的不断追求中，尤其对建筑新高度的痴迷中，武曌以纪念碑取代建筑物，将日常生活拔高到节庆的水平，其目的是宣扬并维护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的统治合法性。正是她启动、资助并推动洛阳中轴线的改造。同时，这一改造也仰赖城市自身的地理特征、既有的建筑技术、以及天命。六九五年正月大火就表达了天命。尽管如此，沿中轴线的城市景观首先是多样背景的人们不断交涉的结果，包括女皇帝武曌、她的情人薛怀义、李唐皇室成员、不同出身和官阶的官吏、宗教人员、遭指控引起火灾的工匠、国际人士，尤其包括日常在城市景观之中活跃的洛阳居民。

二、中轴线以外

从唐朝辅都到武周神都，洛阳的改造并不局限在中轴线上。从国家层面上讲，数万户人家迁居洛阳及周边，神都越发人间盛大。作为城市主要储备粮仓的含嘉仓经过扩建，精细管理，都会日常生活方得以正常运转。从地方层面上讲，皇城新设立的监察机关刻意避开中轴线，成为武氏恐怖统治的象征。正是武曌推动了这些工程项目。

六九一年七月九日，武曌颁布诏令，其核心内容颇为具体且复杂：

但京兆之地，旧号秦中，迺睠编氓，最为繁殖，一州独治，事多拥滞。宜令雍州管内，析置五州。其间于雍州以西安置，潼关即宜废省。然以千里之内，旧制通畿，征赋所出，事资广达。又王侯设险，以固其国，若无襟带，何以为守。雍州并所析州、同州、太州，并通入畿内。洛州南面、东面、北面各置关。……其雍州旧管及同、太等州，土狭人稠，营种辛苦，有情愿向神都编贯者，宜听，仍给复三年。百姓无田业者，任其所欲。即各差清强官押领，并许将家口自随，便以次量给船乘（“以次”，《唐大诏令集》作“以水次”，上下语意更胜。宋敏求1959：499），作船

次进发（“船”，《唐大诏令集》作“班”，意胜。宋敏求1959：499），至都分付洛州，受领支配安置讫，申司录奏闻。……其有诸州人，或先缘饥岁，流宕忘归；或父兄去官，因循寄住，为籍贯属；恐陷刑名，荏苒多时，未经首出，卫士杂色人等，并限百日内首尽，任于神都及畿内怀、郑、汴、许、汝等州附贯，给复一年。复满便依本番上下。其官人百姓，有情愿于洛、怀等七州附贯者，亦听。应须交割及发遣受领，并委本贯共新附州分明计会，不得因兹隐漏户口，虚蠲赋役。

（李昉1982：2366下-2367下；宋敏求1959：498-499。两处文字稍有不同。）

主题思想非常明确，武周首善之区都畿的巩固和扩张以唐朝京畿地区的人地两失为代价。具体来说，统辖长安及其近郊的京畿核心地带雍州被割裂为五州，以免对都畿构成威胁。伴随唐朝京畿弱化的是该地区世家大族的门户低落。而且新雍州及其东面的同州、太州划归都畿管辖。太州尤其重要，因为控扼长安东面门户的潼关正在此州。武氏诏令特别命令废除潼关以便利洛阳对前朝首都地区的影响和管控。相反地，都畿地区的防御得到了加强，洛州南、北、东三面都设置了新的关隘。

上引诏令的后半部分聚焦鼓励人口大规模向都畿地区迁移。移民分为三类：唐朝京畿地区、同州、太州的居民，户籍非法或缺失的人口，以及主动要求迁入新朝首都地区的人口。第一类人口毫无疑问是主要目标。政府立刻派遣廉洁且胜任的官员组织移民，利用长安、洛阳之间既有的运河体系进行运输，而且移民自迁入之日起免除税赋徭役三年。破产移民迁入之后还可以“任其所欲”地获得田业。这项具体的移民计划和诱人承诺显示武曌的坚定决心和移民的迫切性，前朝首都必须被削弱以免对神都构成威胁。为了确保长安的损失直接转化为神都的增益，武氏命令官吏把移民全部安置在洛阳，其户籍划归洛阳所在的洛州。

第二类人口包括无户籍者、非法注册官籍以享受特权者、以及在逃犯人。这类人口不缴或不足额缴税，也不服或不足额服徭役。为了扩大税赋徭役的人口基数，此诏令给予此类人口在都畿地区准确注册户籍的机会，但以百日为限。武氏希望首善之区户籍和一年免税赋徭役能够鼓励这类人口迁入该地区。如此则人口基数扩大并促进都畿地区的繁荣。针对第三类人口，武氏诏令打开了洛阳城门，欢迎人们迁入这一中华帝国的新中心。

诏令发布十五天后的七月廿四日，雍州、同州等数十万户七州之民迁入洛阳。（刘昉1975：122；王溥1955：1553；王钦若1960：5820上）⁹现存国家人口统计与此次

⁹ 我认为此七州包括雍州析出五州以及东部两州，即雍州、鸿州、宜州、鼎州、稷州、同州、太州。《册府元龟》“太”作“泰”，可能因为两字在表达“大”、“过于”之意时互通。《唐会要》“泰”作“秦”，可能因为字形相近。尽管《唐会要》编纂于十世纪而《册府元龟》编纂于十一世纪，现存最早的记载六九一年大规模人口迁移的《册府元龟》刊行于1642年，而现存最早的《唐会要》刊行于康熙（1661-1722在位）年间，且其通行本编纂者曾经参考《册府元龟》。因此，《唐会要》编纂者有可能以“秦”易“泰”。但也存在一种可能，秦州亦有民户迁往洛阳，而《唐会要》不误。

关于《唐会要》和《册府元龟》的出版情况，请参古畑徹《「唐会要」の諸テキストについて》，见载于《東方学》7（1989）：82-95；黄国琦（1890年进士）《册府元龟》序。

人口迁移在时间上最接近的是七〇五年，人口数六百一十五万六千一百四十一户。

（王溥1955：1551；王钦若1960：5810下）假设此次迁往洛阳的最低人口数为二十万，则全国总人口中约3.25%的人口在六九一年七月廿四日在迁往神都的路途中。大量人口迁移，尤其从京畿迁往都畿的人口流动，极大地改变了洛阳和长安及其周边的人口状况。

举国3.25%人口的运输和安置，朝廷财政必然承受巨大压力。通过精细管理位于宫城东北部的含嘉仓，武曌控制了粮食的大规模存储和运输，而粮食、铸币和织物共同构成了七世纪至十世纪中华帝国多元货币体系。（Hansen 2013：155-163）武氏统治期间含嘉仓的有效管理和扩张表明洛阳位居长安之上，一跃成为中华帝国法理上和事实上的经济中心，也部分地解释了位于神都的朝廷何以能够组织六九一年的大规模人口迁移。

位于邙山脚下，含嘉仓选址相对较高，比较干燥，适合储存谷物。不同于隋朝（581-618）两度兴建于洛阳近郊的谷仓，含嘉仓建在城内，即使城市遭遇围困也不会闹饥荒，这是继承自唐朝开国皇帝的智慧。¹⁰1971年考古发掘在含嘉仓遗址发现二百五十九个粮窖，对其中六个进行了挖掘和检测。据推算此仓共有粮窖四百多个。（河南省博物馆1972：第3期，49-62）

武曌从李唐皇室继承了含嘉仓，加以改造以更好地服务神都和整个帝国。首先，首都从长安迁到洛阳，华北平原和淮南、江南两道的粮食储存在含嘉仓即可，而不必再往西运，因为皇室已经离开长安，数十万户人家也已迁出，前朝京畿地区不再大量需要区外粮食。这对于中华帝国极为重要，因为大运河拥堵最严重的节点正在长安、洛阳之间。三门峡处黄河水道被两山骤然挤压，更有两座岛屿矗立在湍流之中，航运变得极为危险。（郦道元1989：355-357）为了避开三门天险，西行货运洛阳至陕州段只能走陆路，陕州之后黄河水流趋缓才能再转为水运。（刘昫1975：2116；欧阳修1975：1365；司马光2013：7016）武曌取消长安首都建制，又迁走高密度人口，该段艰难的陆路运输得以规避。国家粮食运输成本也因此降低。武曌舍弃长安而在洛阳建都都有多重考量，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藉由含嘉仓而得以实现的洛阳经济优势。

含嘉仓的日常管理非常精细。在六个业已发掘的粮窖中出土了八方铭砖，其中四方铭刻于武曌统治时期。¹¹图3即其中一方。

¹⁰ 关于含嘉仓的精彩研究，请参邹逸麟〈从含嘉仓的发掘谈隋唐时期的漕运和粮仓〉。关于仓内粮窖的详细讨论，请参张婷瑜硕士论文《隋唐洛阳含嘉仓遗址复原研究》。

¹¹ 铭砖拓片见河南省博物馆〈洛阳隋唐含嘉仓遗址〉和〈洛阳隋唐含嘉仓的发掘〉，《文物》1（1972）：76；2（1972）：49-62。



图3：窖19铭砖拓片

来源：河南省博物馆1972：第1期，76。

铭文上半部分为：

含嘉仓。东门从南第廿三行，从西第五窖。合纳苏州通天二年租糙米白
多一万三口口十五石，耗在内。右圣历二年正月八日纳了。

下半部分则记载十几位粮仓官员的官职和姓名。而且根据政府太仓管理条例，一块内容相同的铭牌会安放在粮窖外部。（李林甫1992：526-527；刘昫1975：1886-1887）

尽管含嘉仓考古发掘只涉及冰山一角，多数粮窖都压在城市现代建筑物下，这些武周时期的铭砖已经表明武曌统治时代含嘉仓经营有方。铭砖清楚标记粮窖方位，并与粮食一起封存于粮窖之内。砖铭记载粮食产地、纳税年份、粮食种类以及封存时间。经手官吏也记载分明，一旦砖铭内容、牌铭内容与实际储粮不符且超出正常损耗，经手人就要接受质询并承担责任。

含嘉仓在含嘉仓城内，城有四十三万平方米，（余扶危1982：15）城中有运河通过，方便粮食进出。这条运河与大都会水道系统贯通，将含嘉仓与洛阳各市场连接起来，并最终汇入帝国大运河体系。为了提高运量，七〇一年在含嘉仓东南新修水潭作为帝国粮船集散地。（刘昫1975：2113；欧阳修2013：982）以上讨论聚焦武氏统治下的粮仓体量、管理方法、运输维护及扩张。含嘉仓到底储粮多少以证明以上行为耗费的劳动力和财富是合理的呢？我们没有这一时代的直接证据，不过七四九年的数据尚存。此年官仓共储粮一千二百六十五万六千六百二十石，而含嘉仓储粮五百八十三万三千四百石。这一数据表明当洛阳作为首都的时候，含嘉仓极有可能存储着帝国官仓

一半的粮食。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武曩手里掌控的经济力量以及神都在国家经济中扮演的主导性角色，也解释了武氏统治时期中国社会表现出的整体稳定特征。

与含嘉仓巨大的设计体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皇城西门其貌不扬的丽景门。然而，此处却是神都皇家各级官吏堪称最为惧怕之所在。正是在此处武曩建立了一所监狱，针对朝廷官僚的可疑行为展开重点调查，该监狱以“非死不出”而广为人知。（刘昫1975：2143-2144；欧阳修1975：5905-5906；司马光2013：6667）该处选址值得仔细观察。对百官进行监察的御史台规规矩矩设立在中轴线上，显示其不偏不倚、追求正义的立场。（徐松2006：275）而这所监狱则刻意设在丽景门边上以躲避权力中轴，表明它是一个临时机构，其执行犯罪调查和定案也不必严格遵循正规步骤。而且，它的选址有意偏居皇城西南角以远远避开东城东北的大理寺。（徐松2006：276）大理寺虽有复核法律实际执行情况的责任，关押在丽景门边监狱里的嫌犯心知肚明追求法律复核的道路布满荆棘且遥不可及，实际上往往是个死胡同。因此，当正规司法程序在丽景门确实遭到忽视的时候，恐惧在洛阳人中间散播开来，朝官之间尤其如此，因为他们的衙门恰好就在这座监狱的东面，十分“便利”。丽景门成为武曩恐怖统治的鲜明象征，朝官们直呼其为“例竟门”。（刘昫1975：4838；欧阳修1975：5906；司马光2013：6667）

据《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史料记载，丽景门监狱主要由酷吏管理，比如来俊臣（651-697）、周兴（死于691）等。（刘昫1975：4836；欧阳修1975：5903-5904；司马光2013：6673）考察来俊臣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审讯如何进行、结果由谁决定或影响。来俊臣出身低微且有含糊之处，是两个男性赌徒和一个女人纠缠的结晶。后来，他告密和诬陷的才能为武曩赏识，升他作侍御史。

则天于是于丽景门别置推事院，俊臣推勘必获，专令俊臣等按鞠。

（刘昫1975：4838）

为了不断取得理想的收捕结果，来俊臣这样出身低微的司法官吏几乎不可避免地诉诸诬陷，因为他们没有显赫身世，朝堂之上也无有力朋友。来氏精于此道，前后不惜处决千户以向皇帝表达忠心。他还与人合著一书，记录酷吏骇人听闻且精妙绝伦的审讯技巧。（刘昫1975：4837；欧阳修1975：5905-5906）

然而有一次，七位官吏即将处决的时候，皇帝却进行干预，声称“就群公乞知古等”。毫不意外，处决立刻撤销，来俊臣等酷吏妥协了。（刘昫1975：2818；欧阳修1975：4189-4190）最终，来氏揭发了武氏家族太平公主（665-713）以及武曩情人们的罪行。他们联合起来揭发来氏罪恶，控告他谋逆。皇帝在洛阳西市公开处决了来俊臣。（刘昫1975：4840；欧阳修1975：5907；司马光2013：6722）

来俊臣的遭际揭示了武曩恐怖统治的内核。它在远离中轴线的丽景门执行，这里的官吏在传统帝国官僚体系中没有晋升机会，完全依靠绝对服从和忠于武曩来换取皇帝的赏识以成就事业。几乎可以肯定武曩对于监狱里滥用酷刑、诬陷横行、罗织罪名的行为洞若观火，但是她也深谙刑律滥用带来的恐惧，并加以充分利用来控制除自己以

外的所有人，维持一个以自我为核心的辐辏体系。借助丽景门的这个法律机构，武氏常常在与臣子，尤其在与帝国官僚的争执中占据上风，确保各种人事、国事运转在正确的轨道上，而正确与否主要由她决定。当有酷吏偏离正确轨道的时候，即刻惨遭屠戮且公开处决，向大都会的看客们宣示谁有罪过、谁掌权力。

洛阳中轴线以外，武曌极大地改变了神都人口状况，将这座城市改造为中华帝国经济中心，并巩固自己的帝位。这些成就以及其他一些好坏事由使武曌成为热点话题，不仅在公共领域，也在私密领域。

三、流言的力量

作为历史地理现象的城市不仅存在于具体的时空之中，也存在于充斥这一具体时空的城市噪声之中，而流言就是噪声之一种。对于流言的讨论，首先需要辨析记载流言的文献来源及其特征。

《资治通鉴》（编纂于1065-1084）记载一场六四八年唐太宗和著名占星家李淳风（602-670）的秘密对话。

民间又传《秘记》云：“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密问太史令李淳风：“《秘记》所云，信有之乎。”对曰：“臣仰稽天象，俯察历数，其人已在陛下宫中，为亲属，自今不过三十年，当王天下，杀唐子孙殆尽，其兆既成矣。”上曰：“疑似者尽杀之，何如。”对曰：“天之所命，人不能违也。王者不死，徒多杀无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几颇有慈心，为祸或浅。今借使得而杀之，天或生壮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孙，无遗类矣。”上乃止。

（司马光2013：6459-6460）

今之视昔，我们很容易知道密谈所指对象是武曌，在那个历史时刻还是太宗后宫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然而这场谈话弥漫着神秘气氛。一开始就引用在民间传播来源不明的书籍《秘记》，既是秘密载记，其内容也就更加神秘，虚实不辨。皇帝开始忧心，但调查却是暗中展开的。在皇宫大内的一个安静角落里上演了一场太宗和占星家的私密对谈。后者劝皇帝听之任之，毕竟天命难违。即使皇帝的介入起了作用，也只会招来反弹，后果将更加严重。换句话说，尊贵如皇权也不能且不该揭发女主真实身份，并且不得影响其命运。

设置在私密环境里的这一场对话，其历史可信度不高。太宗果真得悉下一代皇帝之后唐朝即告终结？这场皇帝与臣子的秘密交谈还有谁参加并将其记录下来？神秘的《秘记》成于谁手？是否存世或有吉光片羽残留？六四八年这一事件的历史记载来源于何处？表3罗列出这次事件在《新唐书》、《旧唐书》、《谭宾录》中的不同记载。

表3：六四〇年代事件的早期记载

《新唐书》 编纂于1044-1060	《旧唐书》 编纂于941-945	《谭宾录》 编纂于820-840年代
太宗得祕讖，言“唐中弱，有女武代王”。以问淳风，对曰：“其兆既成，已在宫中。又四十年而王，王而夷唐子孙且尽。”帝曰：“我求而杀之，奈何。”对曰：“天之所命，不可去也。而王者果不死，徒使疑似之戮淫及无辜。且陛下所亲爱，四十年而老，老则仁。虽受终易姓，而不能绝唐。若杀之，复生壮者，多杀而逞，则陛下子孙无遗种矣。”帝采其言，止。	初，太宗之世有《祕记》云：“唐三世之后，则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尝密召淳风以访其事，淳风曰：“臣据象推算，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宫内，从今不踰三十年，当有天下，诛杀唐氏子孙殲尽。”帝曰：“疑似者尽杀之，如何。”淳风曰：“天之所命，必无禳避之理。王者不死，多恐枉及无辜。且据上象，今已成，复在宫内，已是陛下眷属。更三十年，又当衰老，老则仁慈，虽受终易姓，其于陛下子孙，或不甚损。今若杀之，即当复生，少壮严毒，杀之立讎。若如此，即杀戮陛下子孙，必无遗类。”太宗善其言而止。	唐太宗之代有《祕记》云：“唐三代之后，即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密召李淳风以询其事，淳风对曰：“臣据元象推算，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宫内矣，从今不踰四十年，当有天下，诛杀唐氏子孙殆将殲尽。”帝曰：“求而杀之，如何。”淳风曰：“天之所命，不可废也。王者不死，虽求恐不可得。且据占，已长成，复在宫内，已是陛下眷属。更四十年，又当衰老，老则仁慈，其于陛下子孙，或不甚损。今若杀之，即当复生，更四十年，亦堪御天下矣。少壮严毒，杀之为血讐。即陛下子孙，无遗类矣。”

来源：刘昫1975：2718-2719；欧阳修1975：5798；胡璩2002：第1册7上。

根据这些现存史料，这场唐太宗和李淳风的秘密会谈作为历史事实记录在传统史书如《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中，史源则来自《谭宾录》。前三书的作者参考、接受并采纳了这本归为子部小说家言书籍的记录。几乎所有传统目录学都将《谭宾录》归入小说类。（欧阳修1975：1542；晁公武1990：566；脱脱1977：5221；顾廷龙2002：第1260册5-29）唯一将其归入史部的是王尧臣，120。当历史载记采用小说家言的时候，史部、子部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所以，当我们依赖两《唐书》、《通鉴》等传统史书记载，追求历史精确性和客观性的时候，我们企图达成怎样的历史性？这些传统历史载记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回答“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些著作因为审慎地采纳了小说家言而损害自身历史性吗？

为了回答这些棘手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先回到本文核心人物武曌身边。两《唐书》、《通鉴》都认为六九〇年呈现给她的《大云经》是伪作，作伪者是她的情人薛怀义和几位僧侣。（刘昫1975：121，4742；欧阳修1975：3481；司马光2013：6668）然而编纂于武氏之前的《大云经》现仍存五本且收录于《大藏经》，证明《大云经》并非伪作。（高楠順次郎1988：第12册1077下-1107中，同册1107中-1110下，第19册500

下-506下，同册506下-513下，同册493中-500中）两《唐书》、《通鉴》的作者主张，此经因为薛怀义主导的编辑和注释工作而应认定为伪作，照此逻辑我们是否应该认定经过郑玄（127-200）编辑和注释的儒家经典也是伪作？毕竟王肃（195-256）对于郑玄学说提出了严正挑战。同样的，司马光（1019-1086）在《资治通鉴》里对皇帝尊称“上”，但是对武曌从未使用，我们依理应该推断武氏从未建立自己的王朝并登基，从未统治过中华帝国。

实际上，作为正史的两《唐书》和并非一手史料但常常被作为一手史料使用的史学名著《资治通鉴》绝非仅提供历史事实。其关于武曌的记录尤其如此，因为她是历史上唯一的女性皇帝，幸与不幸皆系于此。因此，Mark Lewis研究从七世纪五〇年代至七〇五年之间武氏把持朝政的这一历史时期，认为尽管这一时段跨度长且重要，对于武氏的所作所为几乎没有什么可靠或有用的记载，只有一些碑刻和几篇佛教文字。因为没有证据，历史学家完全不该相信这些记载。不幸的是，这意味着六十年间朝堂之事一片空白。（Lewis 2009: 36, 288注解12）尽管如此，没有历史人物真得生活在纯然的历史事实之中。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其日常生活远非实录所能囊括。尽管实录是各朝皇帝事迹最重要的官方历史记载，并且是正史编纂的终极原始史料。这一编纂过程的系统化发端始于唐朝，并成就了后代的《旧唐书》和《新唐书》。

（Twitchett 1992: 119-123）武曌也绝非全然生活在历史事实之中。除了传统史书记载的城市景观和历史事件，洛阳提供了一个更加嘈杂的大都会空间。人声鼎沸之中，流言弥漫。一个充满意外和噪音的城市空间才更接近历史事实和社会全貌。选择流言作为此节切入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流言实质上是评价性的社交谈话，话题涉及不在场的人物，（DiFonzo 2007: 19）其内容或真或假，有时候真假本身并不重要。从这几方面看，武曌作为流言话题和散步流言者是能够并且确实激发精彩流言的。这些流言多数记录在子部小说家言之中。

狄仁杰（630-700）是最得武曌信任的宰相之一。据说他有一位卢姓远房阿姨住在洛阳南郊，仅有一子。因为两人从不进城，狄公每逢节庆就向南郊看望他们。某年冬天雪灾频仍，狄公放假前往探望。阿姨独子打猎归来，把猎获交给母亲。故事继续展开：

顾揖梁公，意甚轻简。公因启姨曰：“某今为相，表弟有何乐从，愿悉力以从其旨。”姨曰：“相自贵尔，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公大惭而退。

（李潜1985：375上）

这段记录的前半部分表现了名相狄公的孝顺和关爱。考虑到严冬大雪肆虐，阿姨和独子必定生活艰难，这位宰相敏锐地察觉到表弟的冷漠，立刻施以援手，誓言必定尽心竭力。并且暗示自己作为帝国官僚体系中位居第一的宰相，权重力强，有能力改善他们的处境。阿姨回应的最后两个字改变了这场对话的走向和性质。女主，这个词太宗和占星家在闲话武曌即将兴起的时候也用过的，是这场谈话中唯一不在场的人物。而且卢妇并不是在分享一条中立信息，而是对女皇进行委婉的社会评价。狄公无言地回应，用沉默完成了这场社交活动。总之，这场评价性的社交谈话涉及一位不在场的人

物，卢妇和狄仁杰在制造流言。狄公强调权力及收益，卢妇赞同两者是好东西，但是提出礼仪回绝了他的好意。在她看来，礼仪比权力、收益更重要。她主张武曌作为一个女人不应该当皇帝，而男人不应该在她的朝堂里为官。这一观点在男权社会里深入人心，司空见惯且影响巨大。难怪狄公立刻领悟，认识到自己在这个家庭以及广大男权社会中的地位，轻蔑向他袭来，而表弟是投掷第一块石头的那个人。

对作为流言话题的皇帝来说，随意而日常的贬损评论对她没有好处。更何况流言给人机会和渠道散播消息和看法而不必经过帝国官僚严密监视和主导的正规渠道。因此需要压制对武曌进行负面评价的流言。下述轶事即是一例。

则天之废庐陵也，飞骑十余人于客户坊同饮。有一人曰：“早知今日无功赏，不及扶竖庐陵。”席上一人起出，北门进状告之。席未散，并擒送羽林，鞠问皆实。告者授五品，言者斩，自余知反不告坐绞。

（张鹭1979：160）

这一事件的灾难性结局证明驻扎在首都的精兵在酒宴上散布流言，冒犯武氏，可能招致严重后果。一位飞骑抱怨武曌忘恩负义，他们帮助她推翻李唐皇室而没有得到奖赏。他甚至暗示飞骑们如果联合起来可以改变皇帝的命运。而传统认为皇权天授，人类不得干预。这一点在上述李淳风的意见中已经表达得很明确了。飞骑们在皇帝废立中的集体行动提供这一团队不足为外人道的共同谈资，从而更紧密地把成员绑在一起，形成一个特殊群体，外人不得加入，这个外人尤其包括作为流言话题的武曌。¹²一队驻在首都的军事力量制造对其终极主顾不利的流言，武曌对此绝不姑息。事情穿帮以后，她立刻对其进行无情镇压，整队人马被处决，告密者授官。讯息极为明确，不利于武氏的流言一概禁止，鼓励并奖赏告发。

尽管如此，对流言的镇压大多数时候都是和平进行的，甚至以庆祝的方式。减少或杜绝流言的一个有效方法是作为话题的武曌往前一步，主动向公众展示自己的所作所为。武氏深谙此道并反复实践。明堂落成之后，她广邀百姓前来参观并提供宴会招待，从未见过女性皇帝的他们现在得到机会一饱眼福。在她统治期间，武曌在神都公共场所反复露面。六八八年她在洛水北岸拜洛受图。（司马光2013：6656）六九〇年她主持殿试，亲自策问考生。（司马光2013：6665）六九五年她亲临端门，视察宴会。（司马光2013：6701）事多不胜枚举，各种场合兼备。在武曌的日程表上很可能包含广泛宣传这一项，用以平息关于自己的负面流言。

另一方面，当情况需要的时候，武曌自己也会散播流言。五〇年代她还只是一个后宫小角色。有一天她的女儿突然死了，流言在宫中传播开来，说皇后是凶手。（欧阳修1975：3474-3475；司马光2013：6486-6487）然而，六五五年十月皇帝颁布诏令废黜皇后的时候，对于谋杀之事却只字不提，这项罪名可是流放二千里的大罪。（司马光2013：6656；刘俊文1996：1263-1267）这说明流言未能升级为正式的法律指控，但是

¹² 关于流言的绑定力量，请参Goodman, *Good Gossip*, 39-40。

也没有消散在空气中。尽管缺乏直接证据，很可能人们在宫里盛传这一流言，而武曌有可能是始作俑者。

狄仁杰真得在洛阳南郊遭受了远房阿姨的羞辱吗？飞骑果真在客户坊聚饮，制造朝廷政策的流言吗？武曌到底有没有诬陷皇后弑婴？我们不知道，而且很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但是，臣子是否质疑过武周新朝的合法性？他们中是否有人评论她的政策并传播流言？武曌一生是否曾经以流言作工具为自己谋取优势或欢乐？对这些问题，我强烈倾向于作肯定的回答。除了事实一无所有的城市空间距离历史真实极为遥远。没有流言的洛阳会成为一座居民远走他乡的鬼城，然而六九一年数十万人户刚刚迁入。通常被归入子部小说家言的流言参与塑造了洛阳这个忙碌的大都会，正是在这里武曌展开统治，并于七〇五年将权力交还到李唐家族手中。

结语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性皇帝，武曌其人其事一直以来都不缺乏关注热度，学术范畴内外的讨论长盛不衰。然而女皇的历史面貌依然模糊，其以神都洛阳为中心建立的武周政权依旧包裹在重重迷雾里。这一现象既是历史载记和都市传说不断层累的结果，也是男权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对女皇统治合法性的反复应激、冲突、妥协、消解和破坏等一系列行为在历史书写中的实验与定型的结晶。我们可能永远不能揭开武曌的历史真相，但我们可以努力尝试接近它。因此本文作为一块铺路石，抛砖引玉，何幸如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武曌的成功登基折射出中华帝制在中古时期所特有的成长柔韧性和可塑性。该特性在晚清已经消失，慈禧（1835-1908）面对业已成熟和固化的晚期中华帝制而登基的可能已荡然无存，无论当事人是否有此意愿。促使中华帝制在激变中摆脱可塑性走向男权固化的多重因素之中，就有武曌建立武周政权这一环。

通过一系列努力，武曌成功地建立并巩固自己的统治合法性，其中就包括改造洛阳的物理、人口、经济、政治等景观。在她监督下，这一系统性改造通过洛阳居民的城市生活实践得以实现、重塑和消费。他们的实践不仅在城市土地上结晶和沉淀，而且进入传统史书载记，并且作为叙事在各种非官方渠道里流通，最终以小说家言沉积，其中就包括流言。武曌神都不仅作为历史事实存在，也在大都会流言蜚语的车水马龙里屹立。这才是一个城市社会的历史整体精确性。

尽管传统中国社会女性研究方兴未艾，¹³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性皇帝的武曌，其历史面貌依然扑朔迷离，而且不乏刻意歪曲。在讨论流言在洛阳城市空间流转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功能时，本研究集中分析了武曌作为一位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异类”甚至“异端”色彩。尽管真相的尘网可能依旧无法揭开，本文在发覆中致力于开掘历史书写和都市传说在知识生产过程中或刻意或无意的遮蔽机制，努力展示这一尘网的众多细节，期望能够捕捉到偶尔透出的一点历史真相，吉光片羽，弥足珍贵。

¹³ Doran, *Transgressive Typologies*, 2016; Jia, *Gender, Power, and Talent*, 2018.

参考文献

- Antonino Forte 1976. *Political Propaganda and Ideology in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Seventh Century: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uthors and Function of the Tunhuang Document S. 6502*. Napoli: 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 Antonino Forte 1988. *Mingtang and Buddhist Utopias in the History of the Astronomical Clock: The Tower, Statue, and Armillary Sphere Constructed by Empress Wu*. Roma: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 Denis Twitchett 1979.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3, Sui and T'ang China, 589–906 AD*, pt. 1.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enis Twitchett 1992. *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ndymion Wilkinson 2012. *Chinese History: A New Manual*.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 Henri Lefebvre 1974. *La production de l'espace*. Paris: Éditions Anthropos.
- Jinhua Jia 2018. *Gender, Power, and Talent: The Journey of Daoist Priestesses in Tang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Lin Yutang 1957. *Lady Wu: A True Story*. London: Heinemann.
- Mark Edward Lewis 2009. *China's Cosmopolitan Empire: The Tang Dynasty*.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N. Harry Rothschild 2008. *Wu Zhao: China's Only Woman Emperor*. New York: Pearson Longman.
- N. Harry Rothschild 2015. *Emperor Wu Zhao and Her Pantheon of Devis, Divinities, and Dynastic Mother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Nicholas DiFonzo and Prashant Bordia 2007. *Rumor Psychology: Social and Organizational Approache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P. Fitzgerald 1968. *The Empress Wu*.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 Paul Kroll et al. 2015. *A Student's Dictionary of Classical and Medieval Chinese*. Leiden: Brill.
- Rebecca Doran 2016. *Transgressive Typologies: Constructions of Gender and Power in Early Tang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 Robert F. Goodman and Aaron Ben-Ze'ev 1994. *Good Gossip*. Lawrence, K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 Valerie Hansen and Helen Wang 2013. Introduction, Textiles as Money on the Silk Road.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 155–163.
- Victor Cunrui Xiong 2017. *Capital Cities and Urban Form in Pre-modern China: Luoyang, 1038 BCE to 938 CE*. New York: Routledge.
- W. L. Guisso 1978. *Wu Tse-T'ien and the Politics of Legitimation in T'ang China*. Bellingham, WA: Western Washington.
- William Edward Soothill 1951. *The Hall of Light: A Study of Early Chinese Kingship*. London: Lutterworth Press.
- X. L. Woo 2008. *Empress Wu the Great: Tang Dynasty China*. New York: Algora Pub.
- 常盤大定, 1936, 〈武周新字の一研究〉, 《東方學報》, 第6期, 頁5-42。
- 晁公武, 1990, 孫猛校, 《郡齋讀書志校證》,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陳寅恪, 1935, 〈武曌與佛教〉, 《中研院史語所集刊》, 第5期第2分, 頁137-147。
- 陳寅恪, 1936, 〈李唐武曌先世事迹雜考〉, 《中研院史語所集刊》, 第6期第4分, 頁553-556。

- 陈寅恪, 1954, 〈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 《历史研究》, 第1期, 页33-51。
- 陈长安, 1991,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 《洛阳卷》第7、8册,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 崔致远, 1983, 《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 大藏经刊行会, 《大正新修大藏经》, 台北: 新文丰。
- 杜佑, 1988, 《通典》, 北京: 中华书局。
- 方孝廉等, 2016, 《隋唐洛阳城天堂遗址发掘报告》,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高楠順次郎等, 1988, 《大正新脩大藏经》, 东京: 大藏出版。
- 古畑徹, 1989, 〈「唐会要」の諸テキストについて〉, 《東方学》, 第7期, 页82-95。
- 何磊, 1992, 《武则天传》,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 河南省博物馆, 1972, 〈洛阳隋唐含嘉仓遗址〉, 《文物》, 第1期, 页76。
- 河南省博物馆等, 1972, 〈洛阳隋唐含嘉仓的发掘〉, 《文物》, 第3期, 页49-62。
- 胡戟, 1980, 〈唐代度量衡与亩里制度〉, 《西北大学学报》, 第4期, 页34-41。
- 胡戟, 1986, 《武则天本传》, 西安: 三秦出版社。
- 胡璩, 2002, 《谭宾录》, 顾廷龙等, 《续修四库全书》,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雷家骥, 1981, 《狐媚偏能惑主: 武则天的精神与心理分析》, 台北: 联鸣。
- 雷家骥, 2015, 《武则天传》, 新北: 台湾商务。
- 李昉等, 1982, 《文苑英华》, 北京: 中华书局。
- 李林甫, 1992, 陈仲夫点校, 《唐六典》, 北京: 中华书局。
- 李唐, 1963, 《武则天》, 香港: 宏业书局。
- 李潜, 1985, 《松窗杂录》, 新文丰编辑部, 《丛书集成新编》, 台北: 新文丰。
- 酈道元, 1989, 杨守敬等编, 《水经注疏》,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 林宝, 1994, 岑仲勉校, 《元和姓纂: 附四校记》, 北京: 中华书局。
- 刘景龙等, 1998, 《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刘俊文, 1996, 《唐律疏议笺解》, 北京: 中华书局。
- 刘曼春等, 1997, 《大周女皇武则天》,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 刘昫等, 1975, 《旧唐书》, 北京: 中华书局。
- 妹尾達彦, 1997, 〈隋唐洛陽城の官人居住地〉, 《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 第133期, 页67-111。
- 欧阳修等, 1975, 《新唐书》, 北京: 中华书局。
- 氣賀沢保規, 1995, 《則天武后》, 东京: 讲谈社。
- 饶宗颐, 1974, 〈从石刻论武后之宗教信仰〉, 《中研院史语所集刊》, 第45期第3分, 页397-412。
- 施安昌, 1983, 〈从院藏拓本探讨武则天造字〉, 《故宫博物院院刊》, 第4期, 页30-38。
- 司海迪, 2018, 《武则天重要人物关系考论》, 新北: 花木兰。
- 司马光, 2013, 《资治通鉴》, 北京: 中华书局。
- 松本文三郎, 1944, 《仏教史雜考》, 大阪: 創元社。
- 宋敏求, 1959, 《唐大诏令集》, 上海: 商务印书馆。
- 脱脱等, 1977, 《宋史》, 北京: 中华书局。
- 王溥, 1955, 《唐会要》, 上海: 中华书局。
- 王钦若等, 1960, 《册府元龟》, 北京: 中华书局。

- 王双怀, 2019, 《日月当空: 武则天与武周社会》,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 王双怀等, 2018, 《一代明君武则天》,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 王尧臣等, 1937, 《崇文总目》, 上海: 商务印书馆。
- 吴枫等, 1986, 《女皇武则天》,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 熊德基, 1979, 《论武则天》,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 徐松, 2006, 李健超编, 《增订唐两京城坊考》, 西安: 三秦出版社。
- 徐素, 1958, 《女皇武则天》, 香港: 中华书局。
- 杨伯峻, 1995, 《春秋左传注》, 北京: 中华书局。
- 叶昌炽, 1995, 韩锐点校, 《语石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 余扶危等, 1982, 《隋唐东都含嘉仓》, 北京: 文物出版社。
- 郁贤皓等, 1987, 《女皇帝武则天》,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澤田瑞穂, 1986, 《則天武后: 女傑と惡女に生きて》, 东京: 集英社。
- 张萍, 2008, 〈武则天时期的洛阳城市建设〉, 《中国古都研究》, 第23辑, 页426-438。
- 张婷瑜, 2017, 《隋唐洛阳含嘉仓遗址复原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 张鷟, 1979, 赵守严点校, 《朝野佥载》, 北京: 中华书局。
- 赵文润等, 1993, 《武则天评传》, 西安: 三秦出版社。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2014, 《隋唐洛阳城: 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 北京: 文物出版社。
- 邹逸麟, 1974, 〈从含嘉仓的发掘谈隋唐时期的漕运和粮仓〉, 《文物》, 第2期, 页57-66。